

内蒙古近代史丛书

内蒙古近代史论丛

第三辑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

内蒙古近代史论丛

第三辑

内蒙古大学 中共内蒙古地区党史 研究所 编
内蒙古近现代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 呼和浩特

内蒙古近代史论丛

第三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0.875 字数277千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89.101 印数: 1—2000册

ISBN7-204-00143-5/k·7 每册: 2.15 元

目 录

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	汪炳明 (1)
“蒙古实业公司”始末	汪炳明 (17)
北洋军阀对蒙政策几个问题的初析	王德胜 (26)
京绥铁路早期工人运动史实札记	甘旭岚 (137)
内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	郝维民 (159)
我党帮助冯玉祥并促成五原誓师的始末	罗 宏、孙忠耀 (166)
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 (1928年—1949年)	乌兰少布 (188)
“伊盟事变”的起因及国共两党的不同政策	金 海 (318)

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 的政治活动

汪炳明

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事变。它在全国各地、国内各个民族当中，都引起了剧烈的动荡和反响。辛亥革命时期，蒙古地区主要发生了两大事件。一是由蒙古族革命志士云亨、经权等参与领导的内蒙古西部呼、包等地的反清起义；另一个是以沙俄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援为背景，部分蒙古族僧俗上层搞起来的库伦“独立”、呼伦贝尔“独立”及哲里木盟乌泰的“独立”暴乱。对此，多年来史学界已有不少专题研究和较为活跃的探讨。除此而外，当时常驻北京的一批蒙古族封建王公也曾搞过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在清亡民兴的政治漩流中掀起过些许浪花。对这些蒙古王公的历史活动，人们尚未予以足够的注意。本文谨就这一问题，作点初步的探索。

一、清朝末年的驻京蒙古王公

清朝时期，盟旗制度下的蒙古王公扎萨克，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世袭封建领主的权力和地位。这些被称为“外藩王公世爵”的蒙古王公贵族，在政治、经济上均受到清廷十分优厚的待遇。清代的年班制就是这种优厚待遇的表现形式之一，即让所有蒙古王公分批于每年的旧历新年入京觐见皇帝，参加御宴，受领赏赉。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王公及其子弟常年驻京，在宫廷“入直

当差”，有的还受任例由清室亲贵充任的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及八旗都统等显赫职官。这些官职虽然并无多少实际的军政权力，但品秩崇高，并能经常出入宫廷、接近皇帝。

年班晋京、入值当差，可以享受大都邑的奢华生活，得到种种虚荣厚赏，是常年居处边僻塞外的蒙古封建主们十分向往的事。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蒙古封建统治阶级的愈加贪婪腐化，加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演进，一些王公贵族便以种种借口、施用各种手段，寻求进京常驻的机会，使得常驻北京的蒙古王公人数逐渐增加。

综合各种史料记载，可知清亡前夕在京的蒙古王公有：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尔喀赛音诺颜部扎萨克亲王那彦图、内蒙古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八旗都统、副都统中的科尔沁扎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土默特扎萨克贝子棍布扎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赉、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喀喇沁扎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以及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扎萨克郡王帕勒塔、科尔沁扎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扎萨克郡王扎噶尔、奈曼扎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1〕

在驻京蒙古王公中，地位和影响较著的主要是那彦图、阿穆尔灵圭、贡桑诺尔布、帕勒塔、棍楚克苏隆及博迪苏等人。那彦图是清朝前期平定准噶尔时的著名功臣超勇襄亲王策棱的后裔，阿穆尔灵圭是近代有名的博多勒噶台忠亲王僧格林沁的曾孙，博迪苏也是僧格林沁裔孙。而策棱和僧格林沁是清代仅有的二位得到配享清室太庙殊荣的蒙古王公。那彦图除御前大臣外，还兼任着领侍卫内大臣和列清朝八旗之首的镶黄旗满洲都统等显职。博迪苏也兼任着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等职。身为镶白旗汉军都统的阿穆尔灵圭，还受命为总司稽察守卫事宜王大臣，掌管整顿整个宫廷的侍卫。〔2〕可见，他们作为世勋功臣之后，得到了清廷的很大宠信。

贡桑诺尔布则是个以“兴业变革”闻名的蒙古王公。他不仅在

本旗创办了蒙古族历史上第一座新式学校崇正学堂，还兴办过邮政、报纸、综合工厂等。〔3〕帕勒塔曾东渡日本学习过军事，回国后“入直当差”，担任了陆军贵胄学堂的蒙旗监学。〔4〕棍楚克苏隆也在本旗兴办过民团、学校，并曾以第一优等毕业于陆军贵胄学堂。〔5〕他们可谓蒙古王公中思想颇为活跃、踌躇满志的人物。

在近代中国，蒙古王公贵族是个早已衰落、极为腐朽的社会阶层。而驻京蒙古王公，则是其中爵位高、权势大，并受到封建朝廷更多恩宠的人物。他们同清廷命运与共的利益关系十分紧密。受到剧烈变动的时代影响，他们当中也出现了个别比较乐于接受新事物，极欲“变革图强”的人。但是，他们仍然是蒙古封建贵族阶级的代表，不可能超越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在清王朝即将灭亡的历史转折关头，他们也就必然会站在反对革命、反对民主共和的阵营。

二、武昌起义爆发后驻京蒙古王公的活动

1911年10月10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反清起义。很短的时间里，全国许多地区接连兵变、起义，纷纷通电响应。惊恐万分的清王朝，一方面不得已重新起用一度被黜的袁世凯，急调大批北洋新军南下镇压，另一方面则迫于形势匆忙宣布开放党禁、解散皇族内阁、颁布宪法信条，进行政治欺骗。但是，清军在湖北等地遭到革命民军的坚决抵抗，双方很快陷于对峙状态，而各地的革命起义仍在急速发展。清朝这座腐朽大厦之最后倾覆，指日可待。

面对清朝即亡、共和将兴的局势，蒙古封建贵族阶级，特别是受清廷更多恩宠的驻京蒙古王公们，是既不情愿也不甘心的。所以，他们便开始为挽救清朝、维护自身利益而极力奔走。同时，清廷也想利用他们在蒙古的地位和影响，为延缓自己的统治效力。

武昌起义爆发后，东北地区的革命党人也迅速活动，积极策

动起事响应。清朝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采取种种防范镇压措施的同时，深恐革命活动蔓延蒙旗而“官力不及”，电请清政府派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赴东北“面商办法”。〔6〕12月中旬，阿穆尔灵圭以“钦命办理各盟蒙旗事宜”的头衔，〔7〕抵奉天（今沈阳），旋即返回本旗，担负起协助镇压东北革命的责任。他首先征调本旗兵丁，配合赵尔巽防堵革命党人在蒙旗及邻近地区的活动，并要求赵尔巽拨发军饷、枪械，以武装大批蒙旗骑兵，备调协同清军镇压革命。接着，他又筹备在辽源（今郑家屯）召集内蒙古东部四盟王公会议，还拟派人赴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宣谕朝廷“德意”，安抚蒙古王公，稳定内蒙古的局势。〔8〕然而，由于迟迟得不到枪械、军饷，蒙古王公们也并不积极响应，直到阿穆尔灵圭于1912年1月返回北京，他的加强蒙旗武装和召集王公会议的计划都未能实现。

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和杭达多尔济亲王等封建上层在沙俄策动支援下发动武装政变，宣称脱离中国“独立”，驱逐了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清政府闻变，急忙电令库伦帮办大臣（即蒙古办事大臣）绷楚克车林劝谕哲布尊丹巴等人取消“独立”，并于12月21日任命在京的外蒙古车臣汗部盟长多尔济帕拉穆郡王和新任科布多办事大臣毕桂芳为“查办库伦事件大臣”，要他们急赴库伦“宣布朝廷德意，以示怀柔，藉消反侧。”〔9〕然而，由于俄国驻北京使节的威胁阻挠和库伦方面来电严拒，多尔济帕拉穆等终未成行。〔10〕

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许多名目纷繁、倾向各异的团体、党派。于是，在京的蒙古王公也不甘寂寞，由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博迪苏等首倡，于12月24日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11〕蒙古王公联合会，又被称为“蒙古同乡联合会”、〔12〕“旅京蒙古联合会”或“蒙古联合会”。〔13〕据当时的报纸刊载，蒙古王公联合会的《章程》共有正文八章二十一条、“附则”一条。其有关宗旨、会员、会址的规定为：“本会以开通蒙

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辑睦为宗旨”（第一章第一条）；“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议员及现有任职之台吉、他（塔）布囊、旗员等为会员”（第二章第二条）；本会“设总会于京师，设分会于蒙古各地”（第八章第十八条）。〔14〕

联合会成立的第三天，即12月26日，由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多尔济帕拉穆、博迪苏等四人牵头，有蒙古各个部盟的阿穆尔灵圭、杭达多尔济等二十四位王公世爵副署，以“蒙古全体代表”的名义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了一件信函。信一开始就吹捧袁世凯是武昌起义、“分崩云扰”之际“只手擎天”的“再造中国四万万生灵者”。蒙古王公们还竭力表示对清朝皇帝的忠心，要求袁世凯不要向南方的革命势力妥协退让。信中还说，库伦宣布独立并不是背叛清朝皇帝，而是恐怕中国会改为民主。蒙古王公在信中还要扶，“倘从共和之请，代表等恐蹈库伦之续”。通览全文，其主旨即是“痛心疾首，期复旧观”。〔15〕

大致与此同时，驻京蒙古王公还以内外蒙古10盟（部）135旗的名义，由外藩世爵中地位最高的科尔沁图什业图、达尔罕、卓里克图三亲王，及喀尔喀三汗并赛音诺颜亲王等联合署名，致电当时南北议和的民军代表伍廷芳，表示反对共和、拥戴清朝，并攻击革命党人是“狭隘民族主义”。稍后，蒙古王公们唯恐前电简短不能达意，又给伍廷芳发了一封千余言的信函。这封信指责民军方面不允议和罢兵，“致兵连祸结”，“趋全国于黑暗之天日”；声称“满蒙藏回……只知有君主，不知何所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并且口气强硬地声言：“如诸君子固持己见，骛虚名、速实祸，以促全国之亡，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云云。〔16〕

在以上这些函电上署名的王公，都是蒙古各个盟旗中爵位高、影响大的人物，并且还往往身兼盟长、副盟长、钦选议员等头衔。然而，如果稍加注意就可以看出，其中有不少人当时并不在

北京。例如在给袁世凯的信上署名的王公中，阿穆尔灵圭当时在东北；绷楚克车林当时在库伦蒙古办事大臣任上；外蒙古的车臣汗阿克旺那林、赛音诺颜亲王那木囊苏伦、土谢图汗部亲王杭达多尔济等则是库伦“独立”的参与者甚至主要骨干。显然，这些人的名字列在函电上，是出于首倡者的“伪托”。但是，从以上函电的内容来看，它终究是明确表达了蒙古王公们对当时政治局势的基本态度，代表了封建特权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愿。所以，虽然副署名单中存在着不实之处，这些函电仍不失其广泛、普遍的代表性意义。

据中见立夫引述的日本外务省有关档案，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时曾作出决议：如果中国的政体变为共和制，“蒙古全体就要仿照库伦的作法从清国分离出去。”〔17〕不过，前引该会《章程》中的宗旨，除了强调“保存权利”，并没有对国体的变动及变动以后“蒙古全体”的去（分离）留问题明确表示态度。同时，从蒙古王公给袁世凯、伍廷芳函电的整个内容来看，所谓“恐蹈库伦之续”、“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等等，也没有明确的已决意去做的涵义。进而，同样据日本档案记载，在联合会成立时，蒙古王公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大部分王公主张待政局稳定以后再考虑自己的去留。〔18〕

总之，在武昌起义爆发不久的时间里，阿穆尔灵圭等个别受命担负一定职任的蒙古王公，并没有为维持清朝统治、镇压反清革命（包括取消库伦“独立”）做出什么实际成效。为了适应形势，驻京蒙古王公也成立了自己的政治团体。但是这个联合会只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并没有制定出多么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针对时局的具体主张。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人组成这样一个很不像样的政治团体，并且联名向南北两方表达“政见”，无非是在他们对时局的变化既不能有效地影响，又难以预测的情况下，向当时的政治舞台显示一下他们这个社会阶层、势力集团的存在。无论政局如何变动、政治如何变革，最高统治者都应考虑到他们这

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也就是“期复”在政治经济上得到优厚待遇的“旧观”，“保存”实行封建特权统治的原有“权利”。驻京蒙古王公们的这一基本企图和意向，在其尔后的活动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三、清廷御前会议上的蒙古王公

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是个阴险狡诈的反革命野心家。他被清廷重新起用、掌握了军政大权以后，便想借南北对峙、政局混乱的时机，篡夺全国政权。为此，袁世凯一方面利用反清革命的势头，步步进逼胁迫清帝退位；同时又以清廷反动封建势力不肯轻易妥协相要挟，企图迫使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新政权让出最高权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廷由隆裕太后主持召集了一系列讨论王朝最后命运的御前会议。这些御前会议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议决由国会公决国体；讨论是否同意共和、清帝退位；决议接受优待条件、清帝退位。出席御前会议的除了清朝皇族近支王公和袁世凯或其代表以外，还有那彦图等几个驻京蒙古王公中的主要人物。

1911年12月，清廷被迫同意授权袁世凯派代表与民军谈判议和。谈判一开始，民军代表伍廷芳就提出必须以承认国体改为共和为议和前提。28日，由于袁世凯以内阁总辞职相威胁，隆裕太后不得已召开了御前会议，宣布同意召集临时国会，通过国会投票决定国体。^{〔19〕}这次会议虽然作出了“决议”，但仍有不少亲贵王公在会上提出“万不宜行共和”。^{〔20〕}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全国的政治形势更趋明朗。袁世凯在换取了南京方面让予大总统职位和优待清室及满蒙贵族等条件之后，便密奏朝廷，请召开御前会议“速定方策”，迫清帝退位。于是，自1月17日至23日，隆裕太后又召集皇族近支、蒙古王公及袁世凯内

阁的主要成员举行了御前会议。

在这一阶段的御前会议上，满族亲贵大体分为三派：早已为袁世凯拉拢收买的庆亲王奕劻、贝子溥伦，主张接受共和、皇帝退位，说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一定的地位和待遇；反动的宗社党分子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等人，则坚决反对共和，并主张罢黜袁世凯；迂腐无能的醇亲王载沣等多数人，虽不情愿接受共和，但找不到能对抗民军的有效办法，十分颓丧沮丧。与此同时，还有未能与会的满洲贵族、宗社党骨干良弼、铁良等人，在会外为反对共和竭力奔走，甚至围攻奕劻，指斥其“反叛”行为。据史料记载，直到1月23日，御前会议上仍是争吵不休，“皇太后一味痛哭，愁无以应对国务大臣”，结果是“赖亲贵力争，未准共和之议。”〔21〕

据溥伟的《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载，当时出席过御前会议的蒙古王公有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帕勒塔、棍楚克苏隆和博迪苏。〔22〕对于他们在这阶段御前会议上的态度和所起的作用，有关史料及后人的著述中曾有过不少记述。

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在1月17日的会上，奕劻主张接受共和，“因有在京蒙古王公中数人多不谓然，未能定议”。〔23〕报纸还曾以《帕郎不认共和之声明》为题写道：“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以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所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一旦撤消朝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24〕

再从赵尔巽全宗档案中的有关文电来看：1月19日有人从京城发函内称：“前日(17日)御前会议，内阁方辄遽变，庆王首前提倡皇上退位，赞成共和，〔溥〕伦贝子和之。嗣因蒙古王公反对甚力，未得解决”。〔25〕

1月21日，赵尔巽致电阿穆尔灵圭：“实御前会议那(彦

图)、喀(喇沁贡桑诺尔布)两王反对共和,未解决,然甚危,请合力争之”。次日,赵尔巽又打电报给热河都统锡良:“京开御议,亲贵皆赞共和,那、喀二王反对,致未解决。”〔26〕

1月24日,复有人致函赵尔巽谓:“奸贼袁世凯竟吓逼两宫及各亲贵允认共和,仅以蒙古王公与各路军将反对,尚未宣布逊位诏旨”。〔27〕

恭亲王溥伟、贝勒载润都曾亲身参加这一阶段的御前会议。载润的回忆文章提到:奕劻在会上声言革命党势众难抵时,那彦图曾当即予以反唇相讥。〔28〕溥伟的《日记》主要叙述他本人如何在会上力反共和,但是也提到那彦图曾发言劝隆裕太后不要听信庆亲王奕劻。〔29〕

此外,李剑农在《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也写道:在1月17日会上,奕劻主张自行退位,“清太后伏案啜泣,满座无声,忽有一个列席的蒙古王公,慨然起而反对,和奕劻争论”。18日会上,“奕劻仍执前议,并将密定的优待条件提出,蒙族王公反对更烈,亲贵中或意气沮丧,或稍活动,仍无结果而散”。19日继续开,当袁内阁代表提出在天津另组临时统一政府时,遭到“满、蒙的王公亲贵,一致反对。”〔30〕

以上列举的出自不同角度、途径各异的史料记载(包括后人著述),虽然对史实的全面记述不尽相合,但是都相当具体并且相当一致地记录了蒙古王公在其间的态度和作用。由此不难看出结论:这一阶段的御前会议所以未能达成决议接受共和,固然有溥伟、良弼等满族亲贵、宗社党分子的竭力阻挠和张狂活动,但是与会蒙古王公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人的坚决而激烈的反对,同样是一个不容忽略、相当重要的因素。

综观当时的政治舞台和整个局势,参加御前会议的驻京蒙古王公毕竟只是当时一个少数民族中的一部分上层人物。他们在政治军事上既没有多少值得掂量的实际力量,也没有什么可谓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反对革命的阵营中,这些人也只能构成很小的一

翼。但是，这很小的一翼，却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况下确实发挥了作用，即同皇族宗社党分子一起推迟了清廷正式退位的时间，而且，他们还是这股历史逆流中的一支主力。应该说，这是驻京蒙古王公在清朝覆亡之际所起到的“最大”的历史作用。而这种作用的性质，是反动的。

北京的御前会议连日进行之际，远在东北本旗的阿穆尔灵圭也频频给北京内阁和奉天赵尔巽去电，打听会议结果及南北和战的情况。^{〔31〕}然而，当阿穆尔灵圭接到赵尔巽的“请合力争之”的电报后赶回北京时，政治局势已急转直下了。

1月26日，宗社党头目良弼被革命党人炸伤，后身死。同一天，在袁世凯幕后唆使下，段祺瑞、姜桂题等46名清军主要将领联衔致电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权”^{〔32〕}之后，段祺瑞等复于2月上旬再三联电清廷催逼退位，并以率全军人京相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清廷被迫再度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王朝的最后命运。而这时，溥伟、善耆等宗社党骨干已先后匿迹潜逃，其他满族亲贵不再敢持强硬态度，蒙古王公们也看出风向大变，急忙转舵。所以，在这一阶段的御前会议上，满蒙王公只是对民军提出的优待条件加以挑剔，讨价还价，已不再争论是否接受共和的问题了。

在1月29日的会议之前，蒙古王公们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33〕}2月6日，在袁世凯邀集的皇族近支、蒙古王公、军政大员的会议上，蒙古王公们又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结，则为我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34〕}不难看出，这两段话充分表露了蒙古王公对于接受共和虽极不情愿，但是又螳臂无力、百般无奈的心境。

与此同时，鉴于清王朝大势已去，蒙古王公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又直接向南方革命势力提出了意愿和要求。当驻京蒙古王公顽固坚持反动态度时，孙中山、伍廷芳曾分别致电，晓以五族共和之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于是，那彦图、阿穆尔灵圭等便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于2月1日复电孙中山、伍廷芳：“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向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处强邻，危险实多。……”〔35〕

强调制度、文化的不同，强调“民风强悍，逼处相邻”，无非是提醒新的中华民国必须考虑到他们的特殊利益，维持蒙古的旧制度。然而，它比起先前，“锐气”丧失几尽，不过是某种技穷下的讨价还价：如果要我们拥护共和，就得保留我们原有的封建统治特权。

四、殊途同归，纷纷投靠袁世凯

武昌起义爆发后，驻京蒙古王公对今后的命运和去向，本来就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和主张。当清廷的接受共和、宣布退位已属不可逆转之后，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活动便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王公转而投靠新主子，公开打出拥护袁记共和的旗号；另一部分王公则通过私下活动，想从搞民族“独立”中另寻出路。

投靠袁世凯的蒙古王公，以阿穆尔灵圭和那彦图为首，其中包括曾声言要与民军逐鹿中原的帕勒塔。阿穆尔灵圭返回北京以后，即成为蒙古王公联合会中内蒙古的首要代表。〔36〕蒙古王公联合会在阿、那二王主持下，继2月1日的复电之后，又于2月4日致电伍廷芳，提出了清帝退位的条件。据说，此电与2月3日袁世凯提出的清帝退位条件“无一字之异”。〔37〕2月9日，即清帝正式颁诏退位的前三天，蒙古王公联合会更通电南京政府孙中山、黄兴并全国各省督抚，吹捧袁世凯“于大局一事始终苦心孤

诣，……厥功至伟。”声称“同人金谓统一政府临时大总统一席，必须项城（即袁世凯）力任其难，方能维系众心，保全大局。”通电还宣布：“由本会代表全蒙推项城任统一新政府临时大总统”，并要求各省复电响应。〔38〕

蒙古王公联合会通电，毋宁说是以阿穆尔灵圭、那彦图为首的一大批驻京蒙古王公在政治上转而投靠袁世凯的公开声明。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转眼间又成为蒙古封建贵族阶级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主要政治代表。例如，民国以后，阿穆尔灵圭仍然充任“专办蒙旗事宜”职衔，并于1912年10日代表北京政府出席了在长春召开的内蒙古哲里木盟10旗王公会议。〔39〕那彦图于1912年6月受任乌里雅苏台将军，拟代表北京政府赴库伦谈判取消“独立”（未能蒞任）。在民国初期的政治舞台上，他俩还分别被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推为名誉理事或理事，并且几乎不间断地充任各种名目的参议员、议员、参政。〔40〕袁世凯成立蒙养贵族王公的大总统府翊卫处，阿、那二王分别担任了正副都翊卫使。〔41〕阿穆尔灵圭因“首赞共和及劝谕蒙旗效顺”有功，袁世凯还予以最高的“一等嘉禾章”及“支亲王双俸”的奖赏。〔42〕

帕勒塔也是较早投靠袁世凯的蒙古王公。他早在清帝退位以前就被任命为署科布多办事大臣（驻阿尔泰），民国后复实任阿尔泰办事长官。后来，袁世凯还晋封他为亲王，并加封其一子为辅国公。〔43〕其他如博迪苏、祺诚武、棍布扎布、达赛等驻京蒙古王公，也分别充任过各类议员，被晋封爵位，委以翊卫使、翊卫副使等职。

策划搞民族“独立”、分裂的驻京蒙古王公，以贡桑诺尔布和棍楚克苏隆为主要代表。早在1912年初，他们就曾与俄国驻华使节联系求援，后来又转而同日本帝国主义接洽，并分别通过著名的日本浪人、侵华分子川岛浪速同日本方面签订了借款和购买武器的合同。同时，他们还私下串连、拉拢扎噶尔等驻京蒙古王公参加“独立”活动。其中，扎噶尔也同日本方面签订过借款合

同。〔44〕

袁世凯幕后唆使曹錕发动假兵变之后，贡桑诺尔布和棍楚克苏隆分别潜回本旗图谋起事。然而，由于得不到本旗官员及邻近各旗王公的支持和实际响应，加上日本方面秘密运送的武器被东北军阀吴俊升截获，他们策动“独立”的计划均遭破产。〔45〕贡桑诺尔布图谋不逞，只好接受袁世凯的连电邀请，赴京当上了军阀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充任各类议员，被晋封亲王，还一度加入同盟会并被推选为以孙中山为理事长的国民党的理事。〔46〕棍楚克苏隆则没有接受袁世凯加官晋爵的引诱，而是秘密投赴库伦当上了“副总理大臣”，后来客死于外蒙古。〔47〕其他一些曾参与和赞同过搞“独立”分裂的驻京蒙古王公，看到袁世凯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也纷纷步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人的后尘，拥戴起袁记中华民国了。于是，他们也被晋升了爵位，分别当上了各种名目的议员及翊卫使、翊卫副使等闲差。

中国的历史已经到了共和、民主的新时期，但蒙古王公们的封建本性并没有随之改变。例如，那彦图和贡桑诺尔布等人仍然同逊位的溥仪小朝廷保持密切关系，甚至仍然向它面北称臣。〔48〕在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和张勋的复辟事件中，也曾有那彦图、阿穆尔灵圭及贡桑诺尔布等驻京蒙古王公的积极参与或支持。〔49〕

总之，在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们先是极力阻挠清帝退位，后来又及时改换门庭投靠了新主子，有的则企图借助外力搞“独立”另寻出路。究其目的和动机，实质上都是为了继续维持他们原有的封建特权。这些蒙古王公最终又殊途同归，汇集于袁世凯麾下，说明了袁氏北洋军阀政权在政治上的封建反动，同时也说明了蒙古王公贵族阶级本身极腐朽的寄生性。民国以后，这些蒙古王公或者仍住在北京，寄身袁氏篱下充当闲职、食客，或者返回本旗，继续过着封建特权生活。他们在清亡民兴之际曾经喧嚷一时的政治活动，就这样结束了。